

白色悲歌

受難者：郭獻

訪談對象：郭獻之子，郭先生（1943年生，願接受採訪，但不願曝光）

訪談時間：2014年8月6日

訪談地點：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

郭獻小檔案

1914年 生於嘉義縣，年長後到屏東縣潮州鎮成家立業

1951年 因涉及匪諜案被抓，被判感化教育四年

2003年 過世，享年90歲

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，受質疑的角落莫不伴隨著悲歌，即使時間流逝，戒嚴的時代也早已過去，但是那白色的陰影卻始終在當事人及其家屬心中揮之不去。

2014年在採訪郭獻先生的故事之際，其家人願意提供郭獻先生的故事，但堅持不願曝光，也許不是害怕，只是不願那白色的陰影有任何留存的機會。

「只是和朋友在一起，就被莫名抓了起來……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。」在六十多年後，郭先生說起父親的遭遇，內心仍滿腔憤慨。

移民潮州去打拚

來自嘉義朴子的郭獻生於 1914 年，那個年代在嘉義、臺南的鄉間，生活仍十分困苦，屏東則因有阿緞製糖所（臺糖屏東糖廠）的號召，許多人移民到屏東找工作，郭獻一家也是那個時代的移民者，到了潮州後，才開始他成家立業後的人生。

「父親是做農業機械起家的，誰家的機械壞掉，幾乎都會找他……」，在兒子的心裡，父親就是個機械高手，生意也做得不錯，他記得在 1940 年代，潮州鎮就只有三臺機車，其中兩臺的主人是醫生，另一臺就是郭獻的，可以想像，在那個泛黃的古早時代，有一輛機車騎在路上，那可拉風了。

只可惜那樣的好光景並沒有維持太久，後來打仗後，一切就變了。因為戰爭的關係，農村的生活秩序大受影響，光復後郭獻的機械生意只好收起來，轉成佃農，與另一半艱苦地撫養六個孩子長大。

1949 年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，郭獻即是那個時代的佃農，原以為生活就這麼清貧樂道地過下去，沒有想到一場無端的災難，再度讓郭獻一家陷入了困境，最後甚至連三七五減租的租金都繳不起。

佃農的驚恐

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，臺灣島內陷入極度的白色恐怖中，單純如郭獻竟也被波及……。

「父親是做生意起家，交遊十分廣闊。」據郭先生回憶，當時與父親交往的朋友中，有一人被懷疑是匪諜，另一人被懷疑是匪諜的接應人，郭獻是兩人的好友，自然也就被情治單位盯上。

大約在郭獻被抓的一年前，當時擔任農會代表的郭獻有一回參加農會的活動，即有人告訴他「刑事在找你了」，讓郭獻極度地驚恐，往後過了將近一年躲躲藏藏的生活，一直到 1951 年，就在自家的農田邊，被抓了去。

「據父親說，後來被懷疑是匪諜的朋友遭到槍決、被懷疑是接應的友人自殺，情況相當慘。」當時年紀還小的郭先生只記得，有一天父親不再回家，就有人跑來告訴母親：「郭獻被抓了」。

後來是警分局的人來通知「帶衣服」，一家人才驚覺：「害呀！」

而郭獻一家的驚恐還不止這些，郭先生還記得，就在父親被抓後，警察還曾荷槍實彈到家裡搜索，把原本就破舊不堪的住家翻得亂七八糟，媽媽帶著孩子在一旁嚇得說不出話來，他們一家的生活也從此被翻攪到了谷底。

無罪的代價

郭先生回憶，父親郭獻被抓後，一直到轉到軍事法庭才寫信回家，誰也沒有想到，只是交朋友，一審竟被判決死刑，後經申辯，二審終於被判無罪，但仍需在土城監獄接受感化四年。

「據父親說，他在土城接受感化時，念的是《三民主義》、《蘇

俄在中國》等書，主要就是要改變思想」，郭先生還記得，「當時家裡生活很苦，母親也只去土城看過一次，就得為沉重的家計忙碌了。」

在當時郭家人的心裡，始終無法為這一切的變化找到答案，一方面要找管道營救父親，一方面又要求生存，偏偏在這兩方面，郭家都走投無路，「在父親回家前，我們的家就差一點家破人亡了。」

郭獻在入獄前與另一半育有六名子女，他們一度窮到沒有房子住，只得借用村辦公處的房舍，有一度生活實在過不下去，母親甚至考慮「要不要把孩子送人」，還好咬著牙苦撐，終究撐到了父親回來。

郭先生還記得，那時候家裡的生活非常艱苦，清晨五點，媽媽就要帶著孩子挑 50 斤的地瓜葉上市場叫賣，排行老三的他也曾跟著去，什麼叫「淒風苦雨」、什麼叫「眼淚往肚裡吞」的日子，他的母親全撐了下去，就為了一家子，也為了等待那個人再回來。

重生的冷暖

1956 年 12 月，郭獻終於回家了，那一年郭先生已念初中，父親熟悉的身影又回到家中，感覺家裡的支柱又回來了。

郭獻回家後，當時地主要求還地，自然就不能繼續過著佃農的生活，於是郭獻又回到老本行，四處打零工，為人修理農機具，郭先生回憶，那時候母親和姐姐開始工作了，家裡的經濟總算慢慢獲得改善。

郭先生當年初中畢業後，曾一度失學，想幫家裡扛起家計，不過父親郭獻總是鼓勵他一定要再重回學校，他父親總說：「手無分文、家無恆產，不讀書絕對不行。」

他在屏東農校畢業後先去當兵，後來到高中擔任職員的工作，工作期間又到屏東農專夜間部進修，他不僅謹記父親的教誨，而且在父親出獄後，更一路陪伴，與父親有深厚的感情，多年來，父親不止一次描述內心對那一段驚恐歲月放不下的恨。

出獄，看似受難者的重生，其實是另一種磨練的開始。他記得在父親出獄後，有一陣子非常沮喪，因為父親曾在訪友時，直接就被親如師兄弟的朋友趕了出來，對方直接挑明了說「你以後不要來這裡了」，人人都怕受牽連，連好友都如此，更讓父親大受打擊。

就在父親出獄後不久，有一回父親帶他去買東西、看電影，走在潮州的街頭，父親心有所感地感嘆：「以前這裡是很有趣味的地方，現在就不知道了……」

那一回，父子兩人後來走進了電影院，看的電影正是《請問芳名》，電影的情節與父親當時的嘆氣聲，一直交織迄今，始終在他心裡擺盪。

一場白色受難記，究竟會帶來多大的後座力，沒有人知道，除了出獄後，朋友爭相走避外，後來郭先生的弟弟考上警察學校，結果口試未過，家人也認為是受到當年白色的陰影拖累，讓他們一家人又再度痛了一次。

數十年後，一直到 2003 年，郭獻過世，都還對當年這一場無端的白色災難懷著無限遺憾。

恢復名譽

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，郭獻與眾多當年遭受白色恐怖的受難者，都領到了恢復名譽證明書，當時已經八旬高齡的郭獻對自己的名譽十分重視，他不但自己寫陳情書申請賠償，還主動要幫有相同遭遇的友人寫，恨不能一筆抹去過去的傷痕。

不過這一段漫長的白色悲歌，對當事人而言，不止是很深很深的痛，還是無止境的驚恐，郭先生說，據他所知，很多人寧可放棄賠償，也不願意再面對這一段歷史，父親的一位友人也因為驚恐猶在，而放棄陳情申請賠償。

而郭獻在自己最黃金的歲月裡，被判感化四年，加上未判決前的一年拘禁，五年的煎熬，這一段無端的災難，即使等到了白髮，最後換來了一張恢復名譽證明，仍難抹去留在心中的傷痕。